

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沿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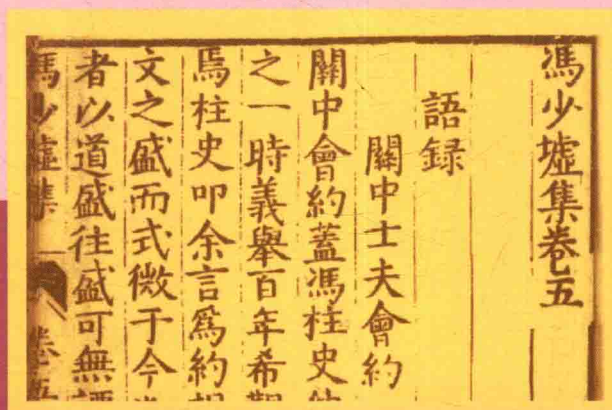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上的 关中士人：907-1911

[新加坡] 王昌伟 著 刘晨 译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 - 1911



中国历史上的 关中士人：907—1911

[新加坡] 王昌伟 著 刘晨 译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 907-1911 / (新加坡) 王昌伟著; 刘晨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11

书名原文: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ISBN 978-7-308-17617-0

I. ①中… II. ①王… ②刘… III. ①文人—人物研究—陕西—907—1911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2531 号

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 907-1911

[新加坡] 王昌伟 著 刘晨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赵 波

营销编辑 杨 硕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92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617-0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主 编

彭国翔

编委会（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毕游赛（Sébastien Billioud,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University Paris Diderot, Sorbonne Paris Cité）

钱德樑（Erica Brindley,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陈玮芬（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陈熙远（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齐思敏（Mark A. Csikszentmihalyi,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傅 熊（Bernhard Fuehrer, Department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hina and Inner Asia, University of London）

葛浩南（Romain Graziani,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yon）

许齐雄（Khee Heong Koh,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吕妙芬（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王昌伟（Chang Woei 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普 鸣（Michael Peutt,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施耐德（Axel Schneider,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 Institute of Sinology, Universität Trier）

冯 凯（Kai Volgsang, Asien-Afrika-Institut, Universität Hamburg）

杨贞德（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胡司德（Roel Sterckx,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魏希德（Hilde De Weerd, Leiden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 SAS China, Universiteit Leiden）

任博克（Brook A. Ziporyn, Divinity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总序

“思想”与“历史”之间的“中国思想史”

彭国翔

2012年夏天，我应邀在位于德国哥廷根的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 从事研究工作时，有一天突然收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公司负责人王志毅先生的邮件，表示希望由我出面组织一套“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沿译丛”。如今，这套书就要正式出版了，出版社要我写个总序。在此，就让我谈谈对于“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一些看法，希望可以为思考如何在一个国际学术界的整体中研究“中国思想史”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可供进一步思考的助缘。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等等都是现代西方学术分类下的不同专业领域，既然我们现代的学术分类已经基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分类体系，那么，讨论“思想史”的相关问题，首先就要明确在西方专业学术分类中“思想史”的所指。虽然我们在中文世界中对“思想史”这一观念的理解可以赋予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内涵，但毕竟不能与西方学术分类中“思想史”的意义毫无关涉。比如说，“中国哲学”中的“哲学”虽然并不对应西方近代以来居于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分析哲学所理解的“philosophy”，但却也并非与西方哲学的任何传统毫无可比性与类似之处，像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所理解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精神践履”（spiritual exercise）以及“欲望治疗”（therapy of

desire) 的“philosophy”，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就和“中国哲学”包括儒、释、道三家的基本精神方向颇为一致。再比如，儒学固然不是那种基于亚伯拉罕传统 (Abrahamic tradition) 或者说西亚一神教 (monotheism) 模式的“宗教”，但各种不同宗教传统，包括西亚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南亚的印度教、佛教以及东亚的儒学和道教，尽管组织形式不同，又都对同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问题，比如生死、鬼神、修炼等，提供了自己的回答。事实上，不独历史这一学科及其进一步的各种分支，对于“哲学”、“宗教”、“伦理”等学科，这一点同样适用。

那么，在西方的学术分类体系中，“思想史”是怎样一个研究领域呢？“思想史”诚然一度是“一个人文研究中特别模糊不清的领域”，但是，就目前来说，“思想史”所要研究的对象相对还是比较清楚的。换言之，对于“思想史”所要处理的特定课题，目前虽不能说众口一词，却也并非毫无共识。正如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所言，“思想史”所要处理的课题，是人们对于其处境 (situation) 的自觉回应 (conscious responses)。这里，处境是指一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脉络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这当然是历史决定的，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历史境遇 (historical situation)。而人们的“自觉回应”，就是指人们的“思想”。再进一步来说，“思想史”既不是单纯研究人们所在的外部历史境遇，也不是仅仅着眼于人们的思想本身，而是在兼顾历史境遇和主体自觉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思想”与“历史”的互动。并且，这里的“人们”，也不是泛指群体的大众意识，而往往是那些具备高度自觉和深度思考的思想家们。

其他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社会史”、“文化史”，与“思想史”既有紧密的联系，也有相对比较明确的区分。比如，按照目前基本一致的理解，较之“思想史”通常指重要的思想家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各自反思，“文化史”往往关注较为一般和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以及作为群体的社会大众而非社会精英在一个长程的社会变动中扮演的角色。从作为“文化史”这一学科奠基人的雅各布·布克

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以及彼得·伯克（Peter Burke）和菲利普·普瓦里耶（Philippe Poirrier）等人对于“文化史”的直接界定，即可了解“文化史”这一领域的特点。因此，“文化史”不但常常整合“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就连晚近于尔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论述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观念，由于同样注重人类社会的整体与共同经验，也成为支持“文化史”的理论援军。至于“社会史”，则可以说是史学与社会科学更进一步的结合，甚至不再被视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一种，而是一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历史现象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像经济史、法律史以及对于社会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包括在“社会史”这一范畴之下。最能代表“社会史”研究取径的似乎是法国年鉴学派（French annales school）了，不过，在史学史的发展中，社会史可以被视为发生在史学家之中的一个范围更广的运动。无论如何，和“文化史”类似，“社会史”最大的特点也许在于其关注的对象不是精英的思想家，而是社会大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通常也被称为“来自下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或者“草根的历史”（grass-roots history）。

其实，在我看来，至少在中文世界的学术研究领域，“思想史”是介于“哲学史”、“观念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之间的一种学术形态。以往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是相当于“观念史”的形态。“观念史”的取径重在探究文本中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比如一个观念自身在思想内涵上的演变以及这一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等。站在“哲学史”或“观念史”之外，从“思想史”的立场出发，当然可以说这种取径不免忽视了观念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从“文化史”、“社会史”的立场出发，当然可以说这种取径甚至无视其所探讨的观念之外的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无视观念所在的社会的复杂与多变。但是，话又说回来，“哲学史”或“观念史”的基本着眼点或者说重点如果转向观念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转向关注文化的多样与社会的复杂多变，那么，“哲学史”和“观念

史”也就失去了自身的“身份”(identity)而不再成为“哲学史”和“观念史”了。

事实上,学术的分门别类、多途并进发展到今天,之所以仍然为“哲学史”或“观念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保留了各自的地盘,并未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下造成相互淘汰的局面,就说明这些不同的取径其实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彼此之间虽然不是泾渭分明,没有交集,但却确实各有其相对独立的疆域。站在任何一个角度试图取消另一种研究范式(paradigm)的存在,比如说,站在“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批评“中国哲学史”存在的合理性,实在恰恰是“思想”不够清楚的结果。“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其实是研究不同对象所不得不采取的不同方法,彼此之间本来谈不上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恰如解决不同问题的不同工具,各有所用,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抽象、一般地说哪一个更好。打个比方,需要用扳手的时候当然螺丝刀没有用武之地,但若由此便质疑后者存在的合理与必要,岂不可笑?因为很简单,扳手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需要用螺丝刀派用场的时候,扳手一样变得似乎不相干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经常讲,各个学科,包括“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等,分别来看都是一个一个的手电筒,打开照物的时候,所“见”和所“蔽”不免一根而发。对此,设想一下手电筒光束的光亮在照明一部分空间的同时,也使得该空间之外的广大部分益发黑暗。通过这个比喻,进一步来看,对于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应当有比较合理的理解。显然,为了照亮更大范围的空间,我们不能用一个手电筒替换另一个手电筒。无论再大的手电筒,毕竟只有一束光柱。而我们如果能将不同的手电筒汇聚起来,“阴影”和“黑暗”的部分就会大大减少。医院的无影灯,正是这一原理的运用。事实上,不同的学科不过是观察事物的不同视角而已。而我这里这个无影灯比喻的意思很清楚,“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等等,甚至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文理科之间,各个不同学科应当是“相济”而不是“相非”的关系。否则的话,狭隘地仅仅从自己学术训练的背景出发,以己之所能傲人所

不能，正应了《庄子》中所谓“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的话。另一方面，却也恰恰是以己之所仅能而掩饰己之所诸多不能的缺乏自信的反映。

一个学者有时可以一身兼通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学术取径。比如说，可以兼治哲学与史学，同时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都有很好的建树。不过，哲学与史学的建树集于一身，却并不意味着哲学和史学的彼此分界便会因此而不存在。打个比方，一个人可以“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但是很显然，这个人只有在练习每一种武艺时严格遵守该武艺的练习方法，才能最后做到“样样皆通”，假如这个人以刀法去练剑法，以枪法去练棍法，最后不仅不能样样皆通，反倒会一样都不通，充其量不过每样浅尝辄止而已。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决不意味着十八般武艺各自的“练法”因为被一个人所掌握而“泯然无际”，尽管这个人在融会贯通之后很可能对每一种武艺的练法有所发展或创造出第十九种、二十种武艺。落实到具体的学科来说，在没有经过“哲学史”、“观念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其中任何一种学术方法的严格训练之前，就大谈什么打破学科界限，无异痴人说梦，在学术上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这是不言而喻的。很多年前就有一个讲法叫“科际整合”，即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互渗，这当然是很有意义而值得提倡的。但“科际整合”的前提恰恰是学科之间的多元分化，只有在某一学科里面真正深造有得之后，才有本钱去与别的学科进行整合。

本来，“思想史”并不是一个很容易从事的领域，好的思想史研究是既有“思想”也有“史”。而坏的思想史则是既无“思想”也无“史”。比如说，对于一个具体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如果治哲学的学者认为其中很有“思想”，而治历史的学者认为其中很有“史”，那么，这一成果就是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反之，假如哲学学者看了觉得其中思想贫乏，观念不清，而历史学者看了觉得其中史料薄弱，立论无据，那么，很显然这就是一个并不成功的思想史研究。因此，“思想史”这一领域应该成为“哲学”和“历史”这两门学术甚至更多学科交集的风云际会之所，而不是沦为那些缺乏专长而又总想“不平则

鸣”的“自以为无所不知者”（其实是“学术无家可归者”）假以托庇其下的收容站。

徐复观曾经说“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应当归结到思想史的研究”。对于这句话，在明了各种不同研究取径及其彼此关系的基础上，我是很同意的。因为较之“哲学史”，“思想史”在“思想”、“观念”之外，同时可以容纳一个“历史”的向度，换言之，“中国思想史”可以做到既能有“思想”也能有“史”。而这一点，刚好符合传统中国思想各家各派的一个共同特点，即一般都不抽象地脱离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而立言。因此，我很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中国思想史”的团队之中，只要充分意识到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不把“思想史”视为一个可以无视专业学术训练的托词，而是一个和“哲学史”、“观念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既有联系甚至“重叠共识”，同时又是具有自身明确研究对象和领域而“自成一格”的学科视角，那么，广泛吸收各种不同学科训练的长处，宗教的、伦理的、哲学的，都可以成为丰富“思想史”研究的助力和资源。

西方尤其美国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史华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人为代表，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达到巅峰，但随后风光不再，继之而起的便是前文提到的“文化史”、“社会史”以及“地方史”这一类的取径。这一趋势与动向，中文世界不少学者“闻风而起”。无论是可以直接阅读西文的，还是必须依靠翻译或者借助那些可以直接阅读西文文献的学者的著作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但是，如果我前文所述不错，各种取径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不同视角，彼此之间非但毫无高下之别，反而正需相互配合，才能尽可能呈现历史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整全，那么，“思想史”的研究就永远只会被补充，不会被替代。如果不顾研究对象的性质，一味赶潮流、趋时势，则终不免“邯郸学步”，难以做出真正富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事实上，西方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迄今也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而且，如前所述，“思想史”和“哲学史”、“观念史”、“文化史”、“社会史”之间，也是既互有交涉，又不失其相对的

独立性，越来越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局面。因此，真正了解西方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来龙去脉及其整体图像，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传统自身的发展变化对于西方中国研究所起的制约甚至支配作用，而不是一知半解的“从人脚跟转”，对于中文世界人文学术研究如何一方面避免“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在充分国际化（“无门户”）的同时又不失中国人文研究的“主体性”（“有宗主”），就是极为有益的。

中国思想史是我多年来的研究领域之一，而我在研究中所遵从的方法论原则，正是上述的这种自觉和思考。也正是出于这一自觉和思考，我当初才感到义不容辞，接受了启真馆的邀请。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推动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些许的助力或至少是刺激。这套丛书首批的几本著作，作者大都是目前活跃在西方学界的青壮年辈中的一时之选。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最新动态。当然，这里所谓的“思想史”，已经是取其最为广泛的涵义，而与“文化史”、“社会史”等不再泾渭分明了。这一点，本身就是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最新动态的一个反映。至于其间的种种得失利弊，以及在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中如何合理借鉴，就有赖于读者的慧眼了。

是为序。

2015年8月18日

于武林紫金港

谨将此书献给家父、家母、家姐，还有内人。

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是我 2008 年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的英文原著的中译本，但其雏形可以追溯到 2002 年，我上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所开设的一门关于中国地方史的课时所呈交的期末作业。包教授在指导我们阅读地方文献的同时，也要求我们针对学界共同关心的一些“宏大问题”（big questions）进行思考。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以地方史的视野思考国史论述的研究方式，震撼不可谓不大，也启发我日后即使在研究理学这种普遍被视为“形而上”，与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时，特别留意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问题，同时把空间、地域的因素考虑在内。

当时选择关学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为了回应韩明士（Robert Hymes）关于南宋精英阶层地方化的问题。韩氏的这个观察，在中文学界受到余英时、陶金生、包伟明诸先生的批评，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理解种种南宋以后才出现的历史现象。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在没有经历过“南宋”阶段的北方，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我当时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投身到关中历史文化的研究中的。可是在书写的过程中，却发现其中可讨论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并不局限于精英地方化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关中和汉唐盛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似乎唐代以后，关中就不再值得讨论和研究。实际上，关中士人从未停止书写家乡的历史。他们为什么书写，如何书写，在不同时期是否有不同的表现？对这些问

题进行探索，将有助我们理解 10 世纪以后关中士人建构身份认同的各种方式及背后所涉及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因素，同时也提供另外一种角度让我们审视国家与地方不同层次的关系。

因此，地方史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显示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从功能上而言，地方史研究重视地域差异，它所能揭示的一些历史现象，是我们纯粹从国史的视域出发所无法解释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一窥当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运动如理学遭遇地方上固有的文化传统时，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复杂多彩火花。本书以关中地区的理学运动—关学—为论述的主线，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此书的中文版得以出版，首先得感谢彭国翔教授向浙江大学出版社推荐，以及译者刘晨博士，出版社编辑赵波先生，还有我的研究助理王楠、王学深等同学的辛勤劳作。彭教授和我同属由台湾吕妙芬教授主持的“明末清初思想史再探”的研究计划的成员之一，在吕教授的牵线下，我得以向其他成员学习，获益匪浅。吕教授也为本书的英文原版写书评，其中多有谬赞之处，在此一并致谢。

求学生涯把我从亚洲临近赤道的热带小国带到北美，学成以后又回到小国服务至今。无论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或是哈佛大学，师长们的教诲是我一生的财富。陈荣照教授、苏新鋈教授、包弼德教授、杜维明教授，以及已故的孔飞力教授对我的种种帮助和启发，是我毕生都不敢忘的。

学术的道路虽说是寂寞的，但我是幸运的。哈佛求学时期的同窗，新国大的同事和学生，时刻都在督促我，提醒我不进则退的道理。理学家讲究师友渊源，其中的深意我越来越能够体会。

是为序。

2017 年 4 月 10 日

草于星洲

目录

引 论	1
第一章 五代至北宋时期：“新的起点”	18
关中与唐宋转型期的士人	19
士人与国家关系的演变	30
张载学派的独特视野	39
第二章 金元时期：“黑暗时代”	62
异族统治与士人阶层	63
《中州集》诗人群，1175—1215	74
一个多元的世纪，1200—1300	80
道学的兴衰，1250—1368	93
第三章 明清时期：“文艺复兴”	107
危机与机遇	109
一个“非官方”士人群的形成，1450—1500	122
张载遗产的多重运用，1500—1600	128
冯从吾与关学的形成，1596—1627	135
体用不二，1644—1911	144
结 论	163
参考书目	171
索 引	190

引 论

“关中为古帝王之州。自周秦以迄汉唐，莫不代建国都。宅中驭外，不惟典章制度，艺术文物，足以代表吾民族之伟大精神者，均以此为渊藪。而山川城郭，宫室园囿，胜迹名踪，所在皆是。即《黄图》、《决录》、《雍录》诸书，考其大凡，亦信乎为吾国文化之源泉地也。自唐之末，政治失其中心，遂陷于崩溃。南宋以后，沦于异域者近三百年，先民建设，益复荡然。降及明清，亦仅视为边防要区而已。吾族文明创造之精深，与夫河山景物之壮丽，鲜有人注意及之。不亦重可惜欤？”^[1]

这段话来自郭英夫于1934年为毕沅（1730—1797）的《关中胜迹图志》的重印版所作的序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古代长安（今西安）所在地的关中，自从唐末失去国都地位起便开始衰落，并且再也无法重振昔日辉煌。郭英夫在那个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时代写下这篇序，并不是为了让读者们关注唐以降就困滞于漫长衰落的关中，而是要他们记住关中辉煌的过往，并珍视那些曾经界定、完善过中国文化的关中地方俊杰的成就。他的目的是号召大家重建西北，复兴中华。^[2]

快进至2003年。时任西安市委书记的崔林涛在为刚出版的《古都西安》丛书作的总序中写道：

[1] 毕沅《关中胜迹图志》，第1页，郭英夫序。

[2] 同上，第1-2页。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古都西安见证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然而，往日这个帝王们希冀长治久安、长久和平的长安城也几度衰落，数遭兵燹，令人扼腕地一度衰落了。……江总书记在西安论述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还说过，中国曾有过盛唐时期的辉煌，但安史之乱后衰落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他多次强调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年轻一代要多学习和了解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文化的养分。”^[3]

虽然两序的写作时间相隔 70 年，郭英夫和崔林涛所描述的关中历史却惊人的相似：汉唐的曾经辉煌及随后的长期衰落。在这种观点之下，关中历史被视作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这一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话语背后存在着一个现实考量：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只有当它具有双重贡献时，它的历史才值得铭记。首先是助益于构造“中国性”（Chineseness）的超历史的定义（ahistorical），其次又有辉煌过去可以用来激发国民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唐以后的关中象征着在过去一千年间中国所走的歧途。在当今这个中国奋力追赶其他国家的新时代，崔林涛认为，中央正尽其所能纠正历史上曾对西部地区犯下的错误。但他同时也暗示，要了解这些错误就必须研究唐以后的西安历史，以免重蹈覆辙。

杜赞奇的里程碑般的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对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观点进行了精妙的探讨和批评。杜赞奇认为，关于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叙述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目的论式的假设之上——它是一个有着悠久且不间断历史的民族国家——那么这一叙述将会压制其他可能的叙述，因而无法准确反映其历史的复杂性。关于唐以降关中历史的叙述正是这样被民族主义话语压制和边缘化的。这种从 20 世纪初便主导了我们

[3] 方光华等著，《关学及其著述》，第 1-2 页，崔林涛序。